

●倪延年 吴强 编著

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

匡亚明题



CHINA MODERN NEWSPAPER AND PERIODICAL HISTORY

南京

出版社

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

倪延年 吴 强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南京

(苏)新登字第 011 号

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

倪延年 吴 强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南京豪利电脑照排中心照排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省文化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125 字数 497 千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305-02462-7/I. 210

定价:14.30 元

责任编辑 王兆先

《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序

方 汉 奇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是倪延年、吴强两位作者在中国新闻史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的成果。他们两位都是图书馆工作者，一位在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一位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他们虽然并不是新闻史教学与研究的专门家，但都对新闻史，特别是现代的中国新闻史抱有浓厚的兴趣，进而有著述之志。他们利用业余时间认真的搜集材料，深入的进行研究，经过了3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40多万字的专著。他们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这3年当中，我们牺牲了全部节假日，几乎每天到12点以后才上床，写得顺手时，还有几个通宵。为编撰此书，我们先后到南昌、武汉、长沙、上海、南京等地图书馆查阅有关历史资料和原始文献，并阅读了所有可以得到的报刊及新闻史方面的著作。经过3年的努力，两易其稿，才完成了这部书稿”。这种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勤奋治学精神，是很值得钦佩的。

由于在图书馆任职，两位作者都充分的利用和发挥了图书馆收藏丰富的优势，特别是他们所在的两个大学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藏报较多的优势，对浩如烟海的报刊历史资料进行了深入的开掘。大量地运用第一手材料，成为这部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这部书的另一个值得肯定的特点，则是坚持用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统率材料,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各时期的报刊活动进行具体的分析。这一点,在第一章对现代报刊诞生的历史背景的分析,对学生报刊的历史作用的分析;第四章对大革命时期新闻事业的分析;第五章对10年内战时期报刊发展情况的分析;第七章对解放战争时期两种报刊之间斗争情况的分析等部分,表现得尤为突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不少中国新闻史的专著和教材,相继问世。本书的出版,为新闻史这块学术园地,又增添了一朵新花,既促进了新闻史研究工作的繁荣,也为国内外关心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的文化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新闻史的教学研究工作者和大专院校新闻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部可供参考的有关我国现代报刊发展历史的新闻史专著,是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

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会员,忝为这个学会的会长,我对他们在新闻史学术领域内的开拓性工作,乐观厥成,并祝愿他们继续努力,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1992年12月12日

于北京林园

* 方汉奇先生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

序 言

包忠文

倪延年、吴强两位年轻同志合著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正式出版，给我们从事图书馆和其他工作的同志以多方面的启示。

首先，从事图书馆工作的同志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是可以而且有能力向某一具体学科专业发展，甚至成为某一学科专业的专门家的。倪延年、吴强的本职工作在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图书馆。他们在为读者服务中，熟悉我国现代报刊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这就给他们研究这一课题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

目前在大专院校图书馆工作的同志，如从专业角度看，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是“科班”出身，毕业于图书情报专业的，一是非“科班”出身，从其他学科专业毕业的。这两类人，在学校教学、科研提供服务中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如何使这两类各自“扬长补短”，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看来，非“科班”出身的同志必须更多地重视图书馆工作的规范和需要，要补图书馆专业的课，要适应本职工作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结合图书馆专业要求更好地发挥自己专业的所长。而“科班”出身的同志，更可以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为丰富和发展图书馆学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一。另外，“科班”出身的同志，也应当在或一学科上补一点课，并在另

一学科上有较多的了解,以便提高自己服务的层次、服务质量。

看来,倪延年、吴强同志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的问世,正是图书馆学科和另一专门学科可以互相渗透的一个确实的例证。它表明:我们的图书馆工作者,只要确定目标,拓展学术领域,加上自己能善于学习、勇于探索、是可以在某一专门学科上有所成就的。其实,在老一辈的图书馆工作者中,确有不少是另一学科的著名学者,这是被过去的实践证明了的。这一点,值得我们的同行深思的。

第二,倪延年、吴强撰写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指出:“报刊是社会时代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和镜子,既是政治、经济、军事及阶级斗争的产物,又是政治、经济、军事及阶级斗争的工具;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反过来又对它们产生一定的影响。”看来,这本书的作者,是从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联系中,把握现代报刊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这部书以展示时代和时代精神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结合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异,从综合分析各个时期的报刊资料和报刊理论研究中,揭示现代报刊发展规律。我以为,作者这里所采用的研究思路,在方法论上颇有特色。一方面,它避免了以阶级斗争史、政治宣传史、文化史、新闻史来取代报刊史的偏向;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把报刊史看作和政治、文化、新闻绝缘的形式主义偏向。这样,这部报刊史的研究著作就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当然,也无可讳言,本书的某些章节的阐述中,还存在着以政治研究代替报刊研究的问题,这是应当指出来的。

第三,这部书的出版,又一次向我们证明,研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相统一的原则、方法。

现代报刊涉及的方面、范围极其广泛。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涉及到各种政治力量、党派力量以及社会心态和社会思潮等等的矛盾冲突。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作者是清醒的。他们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和历史主义,抓住时代和报刊发展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作出切实的思考和剖析,从而勾勒出报刊发展的趋势和历史线索。

大家知道,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片面性:一为借口阶级分析,否认历史主义;一为借口历史主义,否认阶级分析。前者走向庸俗阶级论,其要害在抹煞阶级是一个历史的现实的存在,把阶级观点抽象化。后者走向客观主义,否认历史和阶级的内在联系,把历史主义抽象化。在报刊研究中同样存在着这一情况。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是对立的统一,这是因为历史不能脱离阶级而存在,主要是阶级的历史;而阶级同样不能离开历史而存在,是历史的阶级。

《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正是以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对立统一的方法为指导,对各个时期的报刊的活动进行综合评价的。比如对“五四”时期学生报刊的描述和分析,对大革命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两类相互对立的报刊的斗争情况的描述和分析,就是贯彻了这样的方法。正因如此,整部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具有强烈历史感和政治倾向性的现代报刊发展的历史轮廓。

我作为现代文艺史研究工作者,深感此书关于“五四”时期报刊情况的介绍和分析,对我们把握“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争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很有帮助。其他如关于10年内战时期报刊界“三条战线”的阐述,关于解放战争时期“第三条道路”的论述,可以加深

我们对于 30 年代文艺思想斗争和解放前后文艺思潮的了解。看来,这部书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倪延年、吴强写成这部专书,确为我们现代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应该向他们表示祝贺。我想,他们决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停步不前的。学海无涯,报刊史的研究在我国刚刚起步,许多方面还有待于深入展开。这一点,他们比我有更切身的体会。因此,我也完全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作出更大的成绩的。

* 包忠文先生为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文艺美学教授。

绪 论

绪论,也可称绪言。陆德明解释道:“绪言,犹先言也。”那么,作为本书的“先言”要讲些什么呢?我们想先就为什么要撰写这本《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历程的阶段划分以及我们是按什么原则来撰写这本《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等问题,向读者作一简要的说明。

为什么要撰写这本《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虽然看起来很偶然,但细想起来却包含着某些必然的因素。

首先,我们虽然并不是如一些专家学者或专业教师那样以研究或讲授该方面的课题或课程为社会职业,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对该方面的这一段历史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在撰稿过程中,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与其说是我们在写稿,倒还不如更确切地说是这里面的人物、刊物、事件等吸引我们向前,使我们无法放下手中的笔,直至完稿。有位先哲说过,兴趣是最大的动力,我们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普遍真理的正确性。

其次,各方面的鼓励、支持和关怀,给我们以巨大的力量和信心。当我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向报刊新闻界的专家及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领导以及其他同行们汇报我们的编著意图、请教有关专业问题、寻求各方面的指导时,无不受到热情的支持和鼓励,这种热情的支持和鼓励转变为一种巨大的促

进、鞭策力量,使我们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才有了今天这样一本尽管还很不成熟的小书。

再则,是我们所处的比较优越的客观条件,为我们顺利完成该书的撰写工作提供了物质保障。无论是南京大学图书馆,还是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对这一方面的原始文献和研究书刊的收藏都达到了相当丰富的水平(在全省仅次于江苏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我们作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既有保管好并向读者提供优质服务的义务,更有充分利用这些文献资源进行力所能及的研究探讨的有利条件,而这两校图书馆的领导、同志们对我们的工作又给予极大的帮助和支持。

最后,是客观存在的一个社会需要促使我们萌发了撰写《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的动机,并付诸于行动。由于职业和兴趣的原因,我们曾力图寻找到一本研究这一段报刊发展史的专著,供自己学习充实。但仅我们所见,国内尚未有出版;查检了港台书目,也未见报道——当然也可能是我们孤陋寡闻,查检不周,已有而未查检到。我们拜读了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该书主要叙述内容是从古代到1926年(主要是1924年以前的资料),从1926年到1949年间约25年内的历史未能叙及;我们更细读了方汉奇先生的《中国近代报刊史》,该书主要叙述了从1815年到1915年间这100多年时间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概况,而对1915年到1949年间的中国报刊发展概况,因书名所限未便叙及。有鉴于此,我们遂斗胆萌发出了一个狗尾续貂的想法,即编著一本反映从1919年到1949年这一阶段中国报刊发展概况的《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一方面使我们自己通过撰写此书而得到学习充实,另一方面也企求能满足那些和我们一样对这段报刊发展历史感兴趣的读者的要求。

正由于上述几方面的因素,互相作用和促进,使我们产生了撰写这部拙作的念头,付诸于行动,就有了这部拙作。

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概而言之是中国从1919年到1949年10月前的这一历史时期（史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报刊发展的概况和规律。既然是历史，就客观地存在一个分期问题。如何划分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的不同历史阶段，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报刊是社会时代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和镜子，既是政治、经济、军事及阶级斗争的产物，又是政治、经济、军事及阶级斗争的工具；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反过来又对它们产生一定的影响。报刊发展史不等同于新闻事业发展史（虽然报刊是新闻传播的主要媒介），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和特点，研究新闻事业发展史离不开对当时报刊的研究分析，而研究报刊发展史则可不必要涉及电台、通讯社以及新闻采访、编辑等方面的特殊问题。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把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划分为：五四运动阶段；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阶段；大革命运动阶段；十年内战阶段；抗日战争阶段及解放战争阶段。在对所见到的史料及文献资料进行初步分析研究以后，不难发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中国现代报刊的发展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

（一）为了探寻中国现代报刊发展的社会环境，我们把从古代到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以前的这一阶段，归纳称为中国古、近代报刊发展阶段，是因为先有了中国古、近代报刊的出现和发展，才为中国现代报刊的出现提供物质基础和社会舞台。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制约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从报刊发展的自身以及产生近代报刊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探讨了中国现代报刊发展的起源和社会背景，以求对中国现代报刊的来龙去脉作一比较明了的介绍。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中国近代报刊所呈现的主要社会特征是报刊从宫廷走向社会；在制造工艺上从手工趋向半机械化或机械化，并且已明显地表现为维新派和保皇

派政治斗争的工具的特点。而直接促使中国现代报刊产生的则主要有三个基本因素：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无产阶级的觉醒以及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报刊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等。

(二)五四运动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而当时以鼓吹“科学”“民主”为主要时代精神、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知识分子创办的《新青年》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型报刊，则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们首先在文化领域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尔后进一步在思想领域发起了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时间，白话文成为时尚，自由诗风行诗坛，与此同时，他们依据进化论、无政府主义等思想武器，对封建旧文学、旧伦理、旧道德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和无情的批判。而为了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由北京学生首先发难，后来形成全国性风潮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则标志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由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思想解放，使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现代报刊从一出现就表现出巨大的战斗力和广泛的社会性，形成了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的第一个高潮。如后文所述，从1919年到1921年6月以前，全国新创刊的刊物竟有120种之多（还未把数量更多的学生报刊、工人报刊及秘密刊物计算在内）。《中华民国文化史》中认为“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就开始传播。……当时全国宣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达200多种。”^①若加上其他的刊物，数量必定更加可观。这一阶段中的报刊所显现出来的主要社会特征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笼统介绍西学发展为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民主”思想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由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反对保皇派的斗争发展为反对封建保皇派及封建王朝所赖以存在的封建制度及其所代表的封建思想意识形态；报刊的内容直接干预社会政治生活，进步报刊的战

^① 史全生，《中华民国文化史》（上）（前言），P19。

斗作用更为明显,也更使反动当局恐惧;学生社团和学生报刊风起云涌,几乎超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时期的任何阶段。客观地说,由于这一阶段中其他报刊发展未赶上时代发展,所以有意无意地使学生报刊在报刊界大显了神威,而到抗战时期虽然学生抗日救亡报刊也一度迅猛发展,但终因其他报刊已发展成为社会报刊的主体,所以再也没有能取得五四时期学生报刊这样辉煌的历史地位。而五四报刊发展中最重要一个时代特点则是一批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在我国共产主义者队伍的先驱李大钊等人的引导下,通过报刊活动得到了锻炼,逐渐成为思想界的杰出人士,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进行了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正因为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瞿秋白等创办的《新社会》等刊物在思想界产生的巨大影响,才使思想界逐步认识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为他们日后的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

(三)五四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我国得到较广泛而有目的的传播。在马克思主义的启发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深入社会基层,发动工农,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时代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出了客观的需要——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自发的工农运动不可能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于是在1921年7月1日,“中国产生了共产党”。从酝酿到正式建党,其间大约又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为了从思想上、理论上对建党进行必要的准备,上海、北京、广州、湖南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都创办过性质相近的报刊。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就写进了关于党的报刊工作的内容,所成立的三个委员会中就有一个负责宣传工作的委员会。由此,中国现代报刊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组成部分,即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报刊事业,这是中国现代报刊史上的新纪元,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实现了中国无产阶级报刊事业从无到有的零的突破,进而影响了中国现代报刊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这也是中国现代报刊在这一阶段发展中的根本性的时代特征。

(四)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积极投入并领导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由于孙中山早先依靠军阀反对军阀的政治路线不可能胜利而屡受挫折,加上以列宁为领袖的苏维埃俄国的无私支援,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短短的时期内所表现出来的领导人民革命斗争的巨大力量,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个波澜壮阔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即国共合作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称大革命时期)。在这一阶段后期所进行的北伐运动和农民运动以及与之相适应创办的一批军队报刊、农民运动报刊以及由国共两党合作创办报刊和由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人创办、编辑出版国民党党报等,就形成了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上的基本特点。在大革命中,北伐战争的号角,标志着中国人民进入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历史新时期,并且为中国共产党人后来的武装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为了宣传教育军队的官兵,懂得他们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解放劳苦大众去打仗”而不是为了“当兵领饷吃粮去卖命”,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司令部政治部都创办了一些报刊。就是它们,成为我国现代军队报刊的起源(当然,在战争后期,由于大革命统一战线分化为左派和右派两个阵营,这些报刊也就分属于两个营垒了),填补了我国现代军队报刊的空白。而中国革命必须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则是共产党人的首先发现,并因此化大力气创办了一批独立的农民运动刊物,还尽量利用国民党的力量由共产党员主编出版了一些农民运动刊物(如毛泽东同志就主编过《中国农民》)。凡国民革命军势力所及的范围都建立起农民协会组织,一些省、县甚至乡村农会组织都创办了刊物。就中国现代报刊体系的结构而言,军队报刊和农民运动报刊的大量出现是这一阶段区别于其他历史阶段的最为明显的特点。至于国共两党合作创办报刊和由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编辑出版“党报”,则是在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中的特殊现象,待到国共合作破裂,这一现象即迅速发生变化。但军队报刊和农民运动报刊在以后的

历史阶段中却一直绵延不断，成为中国现代报刊体系中的组成部分。

(五)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叛变，加上中国共产党当时还处于幼年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着党中央等原因而最终失败。中国历史进入了第二次国内战争阶段(史称十年内战时期)。因为蒋介石掌握着庞大的“国民军”，控制着国家政权，所以在建立起反动统治后可以立即着手建立其反革命的报刊宣传体系，同时则对共产党及其他进步党派、团体和个人创办的报刊极尽摧残之能事，中国现代报刊遭到了国家实行共和以来的最为残酷的摧残。共产党人及其报刊被迫转入地下或退到国民党势力未及的农村，进步报刊被纷纷查禁，民间报刊大多转向国民党，国民党统治区报刊界被白色恐怖笼罩着。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杀绝，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擦干了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战斗了。公开的报刊不能出版，就地下出版；城市无法出版，就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出版，由此开始形成了中国现代报刊历史中的从属于两个阶级的报刊事业，即国民党控制的反革命报刊事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报刊事业。这是这一阶段中国现代报刊发展的基本时代特点，而本质性的进展则是共产党在其所领导的红色根据地里，创立了完全属于人民的、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用于宣传教育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争取自身解放的人民报刊体系。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也创办了报刊，但那还是在国民党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实际上还带有某些依附性。只有在红色根据地，共产党人才在自己掌握了政权的社会环境中，自由自在地创办能公开表明自己观点、宣传本党政治路线的报刊，毫无疑问，这在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六)由于蒋介石集团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内战政策和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我国的野心，终于在1931年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统制下，东北军忍痛撤向关内，我国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

民地。东北得手以后，日本侵略者又继续把侵略魔爪伸向我华北等地。民族存亡，危在旦夕。全国人民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民族报刊界也纷纷加入了抗日救亡的行列。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肩负民族大义，毅然决然地扣留了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进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新阶段。作为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现代报刊的基本时代特点是，自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一直被作为“匪”剿的中国共产党人，获得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合法地位，并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办了第一张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而报头又是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题写的，充分体现了在外敌入侵时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时代主旋律。而汪精卫公开投敌并组织汉奸政府后，在沦陷区创办的一批为日本侵略者“大东亚圣战”鼓噪的汉奸报刊，则是中国现代报刊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出现的一股逆流。这股逆流从出现之日就受到全国爱国群众和人士的唾弃，最后掉到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了。尽管在国共合作抗日的特殊历史环境中，但国民党集团中的顽固投降势力却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消灭共产党的罪恶目的，他们“外战外行，内行内行”，制造摩擦，掀起反共高潮，面对这些“亲者痛，仇者快”的倒行逆施，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报刊与之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报刊一方面要与汉奸鬼子作斗争，另一方面又要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顽固派投降势力作斗争，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上的又一个明显特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报刊的特殊责任。正由于我党的坚持坚决抗战，并且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共同奋斗，最后才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援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这一阶段，延安的《解放日报》和重庆的《新华日报》，既是人民的希望和旗帜，又是敌人的眼中钉和心病，起到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

(七)解放战争时期是国民党反动报刊事业急剧衰落直至龟缩到台湾小岛上，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报刊事业迅速发展直至取